

《再回首》文学精品（第一卷）

下
册

呼唤

鲁彦周 著

华龄出版社

再回首文学精品
（第一卷）
华龄出版社

再回首》文学精品 第一卷·下册·

编：高

丁 洪 草

李 迪

呼唤

华龄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回首文学精品 第一卷/路遥等著;高洪波等主编。—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5

ISBN 7-80082-492-6

I. 再… II. ①路…②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137 号

《再回首文学精品》(第一卷·下)

高洪波 丁洪章 李迪 主编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小乘巷 21 号)

邮编:(100035)

经 销: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41.5 印张 1060 千字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套

ISBN7-80082-492-6/I·37

全套(上、中、下)定价:48 元 本册定价:16 元

目 录

(下 册)

呼 唤 普彦周 (1)

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高行健 (103)

相见时难 王 蒙 (235)

别了, 蒺藜 汪浙成 温小钰 (368)

● 鲁彦周

呼 唤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在一个省里支左，当时正是“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深入进行斗批改的高潮时期，我在部队里的一位战友尹飞同志，突然也调到我们的科委系统支左来了。

尹飞原是我们部队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年纪很轻，还不到四十岁。颀长的个子，清秀的脸庞，一双很有灵气的眼睛配上他那两道剑眉，使他的英俊的神采里又带有几分魅力。他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才思敏捷，不苟言笑，严肃、勤奋而又温顺。加上他善于做鼓动性的报告，会写总结、起草指示文件，使他在我们部队受到很特殊的重视，很多领导都很喜欢他。解放初期，他还是一个连的指导员，可很快就直线上升了，一九六六年以前，就提到了师的政治部主任，据说，还要提拔到我们军部，担任军的政治部副主任，结果，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受了他的岳父的株连，这次提拔不仅没有实现。第一次派出的支左人员名单也把他的名字勾掉了。

我听说他这次来，还是他主动写了信给我们军的洪副政委，才被批准来的。

我和尹飞是在解放战争后期认识的，那时我还是他的上级，我是营的副教导员，他是连的指导员。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就给了我极为良好的印象。他单纯得象一面镜子，腼腆甚至有些羞怯，平时象个大姑娘，可是却能吃苦，能打仗。理论上也肯钻研，一有空就看书，我常常用他做为例子，批评一些吊而郎当、不求上进的同志。解放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他的地位迅速上升，跑到我的前面去了。我们虽然还在一个部队，但见面的次数少了。即使见面，也感到他开始矜持起来了。有的同志也向我讲过，说他有了不少变化，他现在不象过去那么单纯了，很注意他的直接领导的态度，又很讲究军衔等级。有的同志甚至说他的权力地位观念很强，我从不多的接触中，也隐隐感到他身上产生了某种令人不快的东西，特别是他拒绝了许多主动追求他的一些很好的女同志，而同我们军区一位首长的并不出色的女儿结了婚，引起了不少人私下的议论。但这些议论和看法，随着他的倒霉都无影无踪消失了。

对于他这次所受的株连，我们的一些老战友，都是很同情的。他的岳父是我们军区很有威信的首长，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就失踪了，他的女儿，尹飞的妻子，也在一次车祸里丧失了生命。对尹飞本人，说是要调动他的工作，把他的职务也解除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尹飞的脸迅速苍白起来，尽管他在表面上很镇定，但谁都明白，他正经历着他从未经历过的受挫折的痛苦。这是去年夏天发生的事。

去年秋天，组织上通知我参加支左，临走以前，我决定去看看他。

这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天气晴朗，蓝空里飘着几片薄云，金

色的斜阳，给那些云彩镶上了金边，营房前后的高高的白杨树上的小叶子，在微凉的秋风里索索抖动着，时不时有一两片叶子悄悄落下来，给人一种凄凉寂寞的感觉。

尹飞住的小院，现在也冷落了，原来很整洁很热闹的景象，现在没有了。可能还是他妻子栽的丝瓜、月季、大丽花，因为没人料理，现在也枯黄了。只有那烦人的蝉，仍旧躺在树上喧闹而又凄切地叫着。

我站在小院里，看见他的房门虚掩着。正要进去，忽然听见屋里幽幽飘出洞箫的声音，这使我大为惊讶。我不觉停住步，只听那萧声呜呜咽咽，声调异常悲凉，仿佛在倾诉着对失去的亲人的悲伤和怀恋。

这是谁呢？我知道尹飞是从来不摆弄这些玩意儿的，他一向以正统的军队政治工作人员身份要求自己，对诸如音乐、小说、戏剧，他只是作为政治工作需要管一管，提一提要求，对搞这一行的人，他并不看重他们，更别说自己去弄它了。

我把推门的手缩了回来，沿着走廊，走到他的窗前。我想看看是谁，在这秋天的傍晚，在前政治部主任的房里，吹出这种如怨如诉的萧声。我探头朝里望望，简直不可思议，吹箫的竟然是尹飞本人。

我不禁呆立在窗外。

尹飞大约自己正沉浸在箫声里，沉浸在某种往事的回忆里面，他的面容忧伤而严肃。他坐在写字台边的藤椅上，写字台上放了一块绣花布，布上有几本很旧的用线订的竹纸本子，本子上搁了早已枯萎的花枝。他一面吹箫，一面看着桌上摆的这些东西。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会严肃、矜持，常以标准布尔什维克要求别人的尹飞，我断断续续和他相处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

发现他有这种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

不知为什么，我倒很喜欢我的发现，我觉得这时的尹飞，倒是容易理解的。

我绕回到堂屋门口，喊了声“老尹！”推了推门，房里箫声戛然而止。过了一刻，他打开了房门，军容整肃地站到我的面前，又恢复了平时的庄重。他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把我引进房里。桌上摆的东西，连同他吹的箫都不见了，只有摆得整整齐齐的马列主义的书籍，一本靠一本严肃地立在那里，我问他吹箫的事，他脸上突然一红，忙把话岔开了。

这天，我们谈得很晚。但谈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他没有向我打开他的心扉，而我也不便追问，就这样我们又告别了，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谜。没有想到，时隔一年，他竟然又调到这里。

二

六八年八月下旬，我听说尹飞来省支左办公室报到了，我本想立刻去看他，可是我被我们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宣队和造反派缠住了，因为所里发生了一件骇人的事件。研究所的原党委书记、走资派韩越芳竟然公开跳出来，保护一个反动权威，发表了反革命言论，同时污辱了造反派头头，现在是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于青。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前几天，工宣队和研究所革命领导小组组织了一个批判斗争大会，斗争所里的一个反动权威，让原党委书记韩越芳陪斗。斗争当中，主持会议的工宣队队长和于青，因为对科学太无知，尽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让反动权威回答，这位反动权威忍

不住，反过来挖苦了他们两句，这一下把主持会议的人触怒了，他们对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头拳打脚踢，然后又罚他跪在台上，强迫他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这一切都是当着原党委书记韩越芳的面进行的。韩越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到“反动权威”面前，用身子挡住行凶的人，并厉声斥责他们“你们这些自称代表最先进阶级的，最最正确的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竟然采用中世纪的封建法西斯手法，残酷迫害跟随党多年的学者？你们搞的所谓清队，究竟要‘清’什么人，你们要把这些知识分子‘清’到哪里去？你们是扼杀人才，破坏科研，你们是不是想把中国仍旧推回到落后愚昧中去，……”

韩越芳假使只是保护一下别人，倒也罢了，无非遭到一顿打也就算了，她偏偏发表了一通讲话。这个讲话，当场就被记录下来。造反派认为，这是最猖狂的反扑，是影射攻击，是现行反革命。当天晚上，他们就找到了我，要我立即采取措施，并立即向省科委系统清队领导小组汇报。我当时含糊其辞应付了几句，说我要再了解一下，并劝他们不要急，“假使她真是现行反革命，她跑也跑不了。”我毕竟是军代表，他们虽然不满意我的态度，可当面也只好听从了。

他们走后，我万分踌躇起来了。

对这位韩越芳，开始，我也是不了解的，今年春天我到研究所，就有人向我汇报，说她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她不仅把研究所变成了向党进攻的修正主义的俱乐部，她自己还炮制过大量毒草，其性质决不亚于北京的“三家村”。所以，文化革命一开始，省报就点了她的名，批判她的文章有十几个版面。他们还对我说，她现在态度极坏，没有半点低头认罪的表现，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清队”和斗批改能否顺利地进行下去，攻克

她这个顽固堡垒，是一个关键。

听了这些汇报，我心里开始嘀咕，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决定找她来谈一谈。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叫专政队的人把她从牛棚里带来。在等她到来的时候，我翻着所里的造反派和工宣队整理的有关她的材料。材料上简要地介绍了她的历史，说她是出身于反动文化人的家庭，十六岁投机革命，混进了地下党，十七岁又钻到根据地，在根据地曾被敌人俘虏过，很可能有叛变行为，正在调查中。接着，材料上就讲她的现行罪行，说她是漏网的右派分子，是隐藏在党内的最凶恶的阶级敌人，说她一贯包庇右派、打击左派、网罗牛鬼蛇神，不管是在大跃进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还是以后的岁月里，她都曾向党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利用杂文、论文、科学研究，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我匆匆翻阅着她的所谓罪行材料，但是越看反而越糊涂起来了。这么一厚叠的打字材料，除了帽子，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有许多地方，与其说是罪行，还不如说是表扬，比如说她十六岁“投机革命”，“混进地下党”。这算是什么问题呢？

我推开这种材料，在房里踱起步来。她来了，我怎么跟她谈呢？她要是反问我，她究竟有什么问题，我怎么回答她呢？难道我也能象红卫兵小将一样，叱骂她一顿，让她老实交待反党罪行就算完事？

我的眼光又落到有关她的材料上，我忽然看见它旁边的那几本书，这些书也是作为她的罪证给我送来的。我随便拿起一本翻看着，这是一本论文集，但却是用优美的散文笔调写的。我翻着翻着不知不觉就被它吸引住了。我这人就有这么个毛病，碰

到我所喜爱的书，一钻进去，就把什么都忘了。这时，我的毛病又犯了，我竟然忘了我是军代表，是要研究被审查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罪行材料，我重新坐到椅子上，舒舒服服欣赏起这本“毒草”来了。

这本“毒草”的第一篇，在议论没有开始时，先讲了个故事，说是一九四六年春天，她在—一个山区所看到的蒙昧状况，封建式的教育，竟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的某些地方，继续教育着年轻一代。那里的年轻人，用最大的精力在啃着《四书备注》，八股文章和所谓策论，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对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一无所知，对现代科学文化，不仅茫然到令人吃惊，而且还抱着顽强抵制的态度，山区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都令人想起封建社会，有的年轻人甚至梦想有科举制度，以为那样可以进学中举，飞黄腾达。……

作者是以很沉痛的感情描写这一切的，她写得非常深刻生动。她从这个情况论述到中国封建势力的影响不可低估，反封建的任务还需要深入地进行，她问道：“这些长期生活在小生产者中间，受着中世纪式的教育的青年，大部份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走到革命队伍里来，有的也可能成为一个领导干部，他们会不会也把自己的影响，不自觉地带到我们党内，并影响着我们党呢？”

我被这种很新奇的论证完全吸引住了，直到有人喊了我一声，我才猛地一惊抬起头来。

我第一眼碰到的是向我射来的清澈明亮而又犀利的目光，韩越芳夹在两个拿水火棒的专政队员中间，正目光炯炯地望着我。她看样子只有三十几岁，乌黑的光亮的头发朝后梳着，长圆形的脸上，依旧保留着青春时期的美丽；她穿了件月白色的褂子，长身玉立，又依然保留着纤细的窈窕的身材，只是她的

表情，庄严肃穆，冷若冰霜。

我没有想到她会是这个样子，老实说，我被她的美镇住了，我的心甚至猛烈地跳动了一下。我连忙镇定一下自己，挥了挥手，让那两个扛水火棒的人退了出去。

我目送着那两人带上了门，我不知怎么称呼她，喊她韩越芳同志，似乎不很合式，直呼其名，我又叫不出口。我只好含糊地“嗯”了一声，指指椅子说：“请坐吧！”

她没有坐，又一次闪着大眼打量我一下，突然先问我：

“你是刚来的军代表？”

“我叫任中，”我说，“是来支左的。”

“支左？”她有点嘲讽地笑了笑：“在我们这里，‘左派’的力量已经够大的了！”

我没有想到她此时此刻，竟然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一时找不出话来回答。她又问我：

“你在部队是做什么工作的？”

“文化科长！”

“啊！原来你也是一个管文化的！”她说：“你找我来，想跟我谈什么呢？”

我本来想说，有人反映她的态度不好，不应该跟群众有对立情绪。可我又觉得讲这些话毫无意思。我改口说：“你是原来的党委书记，我想请你谈谈研究所情况。”

“找我了解情况？”

“是啊！我刚来，什么也不知道。”

“你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呢？”

“你所知道的都可以谈，你对我们当前的‘清队’和‘斗批改’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谈。”

“那好嘛！”她说，抿抿头发，坐了下来，很爽快地：“我愿

意向你介绍我们所里每一个人。”

“你说吧！”我说，给她倒了杯水：“不要有什么顾虑。”

“顾虑？”她微微笑了笑：“有什么好顾虑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我不想为自己追求什么，要说有，那也只有信仰，可一个人的信仰是谁也拿不走的，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顾虑。”

“可是，”我说，不自觉地欠了欠身子，跟她谈起心来了：“坦白地说，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是不容易。”她微微蹙起她那依旧很秀气的眉：“说容易，那是假话。我们的一生，不就是为了战胜这些不容易的事而斗争的吗？从晚清到民国，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全国解放，多少人流血，多少人牺牲，多少人为了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哪一件事是很容易的呢？比如你吧，你现在到这里来，你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处境就不会是很容易的。”

“我？”

我没有想到她话头一转就转到我的身上，可我不能不承认她的话是对的。我没有立刻回答她。我怔怔地望着她，我心里在思索，她为什么处在这种境遇里依然能这样镇定自若？她也很仔细地盯着我，大约也在分析我的态度，过了一刻，她说：“我对你有一个要求，能提吗？”

“你说吧！”我不自觉地连忙点点头。

“尽你的可能，替国家保存一些有用的人才吧！”她开始说了，声调里有点哽咽，眼睛里也含着泪水，可能是想起那些正在受摧残的科学家们，她激动起来了：“我们所里很有一些难得的人才，是国家的宝贝，有的是为了热爱祖国，从海外回来的；有的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他们在十七年当中，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他们还会做出更大的成绩，可现在，……我希

望你能尽你的可能保护他们一下。假使说他们有罪，那就把罪过都加到我的身上，让我一人来承担吧！”

她喝了口水，恳求地望着我，我完全被她的真诚的态度感动了，我情不自禁地说：“你放心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现在请介绍一下所里的人员情况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找她来谈话的情况。通过这次谈话以及我多方面的观察了解，对她的为人，也有了较多的认识，她在所里威望极高，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农场工人，非常尊敬她。她亲切朴素，从来不摆书记架子。她个人生活也很独特，到现在仍然是孤身一人，据说曾有不少人追求过她，但都没有能成为事实，有一位研究员曾评论她，说她在婚姻问题上，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命运注定她结不成婚。这个评论是否准确，我不得而知，也不便去追问。但是在政治上、工作上以及在对待上下级的关系上，她确实体现了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有时严到了近于苛刻的地步，她一个人生活，把自己的积蓄，都用在科研事业上。她对别人，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虽然批评起人来，也是非常严厉的，她并不考虑这样会得罪人，她在工作上很成熟，在待人接物上，有时却单纯到叫人吃惊的程度。

对这样的同志搞批判，当然是不容易的，可是，当时一位主管科委的同志，不知因为什么，竟然利用她写的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她抛了出来。强大的舆论压力，加上所里因犯有贪污腐化，几乎被她开除的于青，联合了一些因她要求过严因而对她心怀不满的人，乘机鼓噪，这才蒙蔽了一部分人，在研究所里掀起了对她的批判。六七年初，造反派夺权以后，这种批判骇人听闻地加起码来，许多无中生有的材料，如说她是叛徒、内奸等都在群众当中公布了，这样才在表面上把她孤立

起来，革委会成立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她又成了重点中的重点。

我了解她的情况之后，开始对她有着很大的同情，但是这种同情，又不能公开表露，因为造反派头头于青为主组成的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们，时时刻刻在注意着我，我虽然是军代表，也不能不留心这些。我只能反复强调要执行党的政策，要以理服人，不要搞武斗，不要搞人格污辱。同时，我以找人谈话为名，对韩越芳向我介绍的几位专家，在个别谈话里暗示他们，要他们眼光要放远一些，要善于等待，不要悲观失望，产生其他念头。

正当我有计划地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没想到又发生了韩越芳和他们公开对抗的事件。韩越芳不了解，他们是乘我不在，有意激她“跳”出来，然后把问题摆到我面前将我的军的。

这时，我还不知道尹飞已经被任命为省科委系统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了。

三

尹飞的到来，而且担任了科委系统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消息，对我来说是太及时了。我虽然还没有和他接触，但是我相信受过挫折的尹飞，肯定会支持我，把这件事压下去的。

我在所里，把所谓“韩越芳反扑事件”借口需要调查，暂时按了下去，可是这是不能拖得太久的，我们所里那位领导组长，同时又是省革委会委员的于青，不可能允许我长期拖下去不作处理，他因为知道我十分憎恶他，几次制止他的胡作非为，正在对我有形无形的施加压力。

我去找尹飞，可是几次都没有找到，不是他在开会，就是

他到洪副政委那里去了。一直过了好几天，才在科委系统正式汇报会上见到了他。

我惊异地发现，尹飞又恢复从前的气派和风度，虽然脸色不够红润，还有一点消瘦，但是他精神勃勃，气宇轩昂。他穿了件雪白的衬衫，草绿色军裤，端坐在主席的位子上，含着微笑和一个个走进来的人点头示意，亲切、庄重，和蔼而又不失身份；他见了我，很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并且站了起来。

“啊！任中同志，你好哇！”

“你好！”我也很热情地说：“你来了太好了，我找你好几次都没找到！”

“刚来，头绪太多了，我还没有到你们那里去呢。”他抱歉地说。

“我要找你解决问题呢！”我说。

“什么问题？”

“我想单独和你谈谈。”我说，我不想把我对韩越芳的态度端到会上来。

“行！我住在宾馆，你随时来好了。”

“你现在精神满好，”我望着他说：“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

“我要努力振作起来。”他微笑了一下：“洪副政委也是这样期望我的，他还要我做长期留在地方上工作的准备。”

“留在地方上？”我摇了摇头：“现在工作可不好做，运动怎么发展，谁也没有底。”

“你有点畏难了？”他笑了起来：“怪道洪副政委说你劲头不足呢！老兄哇，可要注意呢！”

“洪副政委？”

“老头子很关心咱们呢！”他低声说：“我们可不要辜负他的

期望，来，到那里坐吧！”

他转身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和另外一些同志寒暄起来了，我也只好找个位子坐下来，等待开会，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韩越芳的事也没有机会和他详谈。

过了几天，我忽然听见一种传说，说是我们所里的那位于青委员已经和尹飞搭上了关系，关于“韩越芳事件”，已经被汇报到省革委会负责同志那里去了。这虽然是一种传说，但不能不引起我的警惕，要是真的这样，不仅韩越芳麻烦，连我也很被动的。

我决定去掉我的古怪的自尊心，再去找尹飞。

那天下午，我骑了车子，到他的住处去。

季节虽然已到九月初了，可城市里仍然热气熏蒸，人行道上的树都低下了头，柏油马路上的柏油被晒化了，闪着黑色的光，象泼了水似的，人们都热得喘不过气来，可是有线广播喇叭，仍照样在轰叫着、狂喊着。一些被专政队押着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黑帮”和其他什么分子的队伍，不时出现在马路中间，火辣辣的太阳，晒着那些光着头的戴着白符号的人们，汗水从他们头上、脸上、蚯蚓似地爬下来。一队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向各单位继续进驻。

我骑在车上，看着这种景象，心里直发沉，我不知道这场运动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它怎样结束，这许许多多被专了政的人，他们的命运又将怎样安排，而我又将怎样对待这一切……

我到了宾馆，找到了他住的房间，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里面忽然有个女的声音问：“谁呀！请进来。”

我惊疑地推开了门，房里确实坐了一位女同志。这使我更